

中国文化史经典精读

主编 冯天瑜 杨 华

高等教育出版社

014035997

K203-53

34

中国文化史经典精读

ZHONGGUO WENHUASHI JINGDIAN JINGDU

主编 冯天瑜 杨 华



K203-53
34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北航

C1723205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文化史经典精读 / 冯天瑜, 杨华主编.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04-038936-4

I. ①中… II. ①冯… ②杨… III. ①文化史—中国
—文集 IV. ①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9269号

策划编辑	梁宝贵	责任编辑	梁宝贵	封面设计	李小璐
责任校对	刁丽丽	责任印制	刘思涵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 刷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5.75
字 数 570 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8.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38936-00

学术经典的文化使命

——“现代学术经典精读”系列丛书总序

张岂之

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一套“现代学术经典精读”系列丛书，邀请我写几句话。我觉得，通过高等教育出版社推出一些有新意的经典读物，有助于传承、弘扬和创新优秀的中华文化，我乐意承担撰写序言的工作。

中华民族拥有源远流长的文明史。中华文化凝结成为丰富的文化经典，亘古弥新，值得后来者不断发掘探讨。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一系列类似的著作带有研究的性质，比如研究《老子》的《解老》、《喻老》（见于《韩非子》），研究先秦诸子的《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不二》、《尸子·广泽》、《史记·论六家之要旨》，后来更有系统探讨学术源流与道统的《伊洛渊源录》、《近思录》、《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著作。这些成果一方面在梳理中国思想学术发展演变的脉络，另一方面在传承和弘扬中华学术精神，比如和而不同的学术精神，在中华学术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五千多年连绵不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文化传承与创新得以世代相传。这也叫做文化的“道统”，这个道统在今天应当发扬光大。

时至今日，学人们在学术园地辛勤耕耘，视野更加开阔，资料更加周详，方法

更加新颖，文字更加平实，形式更加多样，文风更加规范，所凝聚的学术成果，同样也是人们传承和创新文化的重要参考。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编辑出版“现代学术经典精读”系列丛书是有价值的。

当然，这不意味着本丛书所选著作、论文都是臻于完美、无以复加了。实际上，有研究经历的人就能明白，学术研究本是一个不断传承、推进的过程，不可能一劳永逸，在个人或团队的努力下，前后相继，共同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创新，是学术研究中的常态，所以往往难以用僵化的思维去考量丰富多彩、不断发展的学术研究本身。这启示我们，面对现代思想学术史上的名著名篇，我们应尽可能发挥它们的榜样和示范作用；这些研究成果为后来者提供参考和借鉴，使它们在承传文化精神、创新研究成果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不能仅仅从研究形式或规范方面去估价这些成果，尽管规范和形式也是很重要的层面。

我有这样的体会，在学术研究方面，需要有包容与会通的精神，这样就给新课题、新探讨提供了可能，使学术的薪火能够代代相传。中国古代也很重视这种相互辩驳的学术精神和理念，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的《发凡》中明确地指出：“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

学术研究，文化传承，均要继往开来，不断推动学术创新与进步。中国古代学术著作，在梳理学术流变的过程中，侧重学术的继往开来，袭故弥新，“以复古为解放”（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穷本溯源，辨别考证，展现了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和成果。正是这种订正增补，反复斟酌，使中华文化长河滔滔不息，绵延不绝。即使在民族遭遇重创的危急关头，中华文化中卓著的学术精神依然能够鼓励世人勇挑重担，成长为民族发展的脊梁。因为，学术研究和文化经典承载有不朽的文化精神，所以学术兴替往往被视作民族精神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引导人文学科的研究生阅读以往的经典和名著，不仅仅在于丰富专业知识，而且在潜移默化中使自己的精神受到优秀文化精神的熏陶，这将是更加重要的教育目标。

以上写了这么多的话，无非是想说明在学术研究的作品的研读中，应注意凸现其中所隐藏的文化精神，以此作为大学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基础。我想，对“现代学术经典精读”系列丛书的宗旨和意义应有这样的理解。

“现代学术经典精读”系列丛书，旨在向研究生传播文化知识和科研经验，提高研究生的学术鉴别能力和学术素养，为研究生以及青年教师从事学术研究提供帮助。

这套丛书内容涵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最新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所涉文、史、哲、艺术等学科。每卷主编都是该学科领域学有专长的专家，选文尽可能突出学生必读的著名论文（或经典著作的节选），侧重20世纪的研究成果，其中不少是读者较难获得的论著。丛书编者希望所选论著大体上能反映学科研究的学术史体系，简要展现学科研究的发展历程、代表人物及其成果。前言由分卷主编撰写，主要介绍该领域学术史概况及论著遴选标准等，并对所选作品进行介绍和点评。每篇选文后附延伸阅读文献篇目。这使该丛书具有提纲挈领、扩展延伸的双重功能，编选应是有特色的。可见，高等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这套系列丛书，经过深思熟虑，又有在人文学科方面具有丰富教学、科研经验的专家学者主持，不但有益于大学人文学科的建设发展，而且为大学在文化传承创新方面提供了一种实施的途径，值得支持。

在浩如烟海的现代学术作品中甄别筛选出有代表性的精华论文或著作，的确并非易事，也难以避免吞舟是漏、取舍失当的不足。希望这套丛书能为研究生和年轻老师提供文化和研究的滋养，也希望读者朋友能为本丛书的编写提供更多的建议和意见。

是为序。

2012年12月

目 录

001 / 前言

010 / 梁启超与《中国史叙论》

附:《原拟中国通史目录》《原拟中国文化史目录》

029 / 柳诒徵与《中国文化史·绪论》

附:《中国文化史·新版弁言》

043 / 陈登原与《中国文化史·叙意》(节选)

068 / 王云五与《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

106 / 杨联陞与《国史诸朝兴衰刍论》

附:《朝代间的比赛》

134 / 张岱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立演变及其发展规律》

154 / 谭其骧与《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

- 172 / 瞿同祖与《中国法律之儒家化》
- 192 / 吴承仕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者对于丧服应认识的几个根本观念》
- 207 / 梁漱溟与《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
- 223 / 邓嗣禹与《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
- 239 / 潘光旦与《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两个制度的讨论》
- 257 / 徐复观与《中国画与诗的融合》
附：陈衡恪《文人画之价值》
- 272 / 沈从文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引言》
- 283 / 梁思成与《我国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
- 297 / 任继愈与《儒家与儒教》
- 310 / 太虚与《佛教对于中国文化之影响》
- 320 / 许地山与《巫覡道与杂术》
- 336 / 顾颉刚与《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 346 / 胡适与《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 354 / 钱穆与《刘向歆父子年谱·自序》
附：《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

364 / 汤用彤与《魏晋思想的发展》

375 / 唐长孺与《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

401 / 陈寅恪与《论韩愈》

414 / 刘师培与《汉宋学术异同论》

433 / 周予同与《“经”、“经学”、经学史》

445 / 杜亚泉与《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

455 / 何炳松等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附：《我们的总答复》

466 / 唐君毅等与《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节选）

488 / 费孝通与《“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

504 / 朱谦之与《欧洲文艺复兴与中国文明》（节选）

535 / 李约瑟与《东方和西方的对话——1955年英中友好协会主席演说词（节录）》

555 / 索引

557 / 出版说明

前言

文化史学底蕴深厚，然其作为史学一个分支获得独立发展的时间并不久远，故可称之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

文化史以“文化”的发生、发展为记述和探讨对象。在中国学术系统中，早有关于“文化”的深刻辨析。

先贤创造文理义的“文”和化生义的“化”，二字配合使用，首见《周易》：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①

此“人文化成”题旨，揭示一种区别于“神文”的“人文”取向，正是中华文化精义所在。

“文化”作为“文治”与“教化”合义的整词，含义广博，明清之际学者顾炎武曰：

①《易·贲卦》《象传》。

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①

从修身养性到治国平天下，从典章制度到艺文哲思，都纳入“文”的范畴。这已逼近广义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中国学术系统对于边际辽阔的文化，又有精当的分梳，清人龚自珍云：

圣人之道，本天人之际，牖幽明之序，始于饮食，中乎制作，终于闻性与天道。^②

指出物质文明是前提（“始于饮食”），制度文明是中枢（“中乎制作”），在它们的基础上，方可进行形上层面的探讨（“终于闻性与天道”），已有关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区分及联系性的通透认识。

中国传统史学较注意文化事象的记述，史典载有诸子、艺文、经籍、典章、方伎、学案等文化专题内容。《荀子·非十二子》、《庄子·天下》、《尸子·广泽》、《吕氏春秋·不二》、《史记·论六家要旨》、《淮南子·要略》、刘歆的《七略》，二十四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儒林传》、《道学传》，近古学者编撰的《伊洛渊源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清儒学案》、《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等，已具有某一断代学术文化史的雏形。唐宋间涌现的《艺文类聚》、《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类书，辑录了丰富的文化史素材。如北宋初编纂的《太平御览》，分五十五部，是涵盖广义文化诸方面的百科全书。南宋郑樵的《通志》，结撰“二十略”，记述社会生活及自然界各侧面材料，涉及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显示文化观的博大和实在。

当然，就总体言之，以帝王为中心的政治史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线索，“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③，独立的、系统的文化史研究始于清末，由译述东西洋文化史著为开端。

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博学于文”条。

② 龚自珍：《五经大义终始论》，《龚自珍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1页。

③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290页。

二

以西方言之,“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古代西方最渊博的哲人之一亚里士多德皆有深切的文化关怀。然而,从希腊、罗马至欧洲中世纪,史学或以政治军事为记述主体,或以神谱为历史主干,直至文艺复兴方有人文史著涌现。而正式把史学从政治史、军事史扩大到文化史、经济史、工商业史、科技史,是启蒙时代的进展。此间文化史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历史学科,这方面功绩最著者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西方学术界称其为“文化史之父”。

伏尔泰把历史看作理性与迷信的斗争过程,他不满意囿于帝王将相活动的编年史,力主将人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纳入史学研究范围。他在《风俗论》(原名《论世界历史及各民族之风俗精神:自查理大帝至当代》)的序言中宣称,他的著述,“不在于指出某年某个可耻的君主继另一个残暴的执政者之后”,而在于指示“主要民族的精神、风俗、习惯”。^①他高度肯定精神文明对人类进步的作用,认为数千次战争没有给人类带来任何利益,而莫里哀、笛卡儿的著作将成为后人永久快乐的源泉。他的力作《路易十四时代》描绘法国路易十四执政时期社会生活的全景,其中包括艺术与民俗、战争与外交、科学与技艺,成为近代文化史的滥觞。^②

19世纪以降,西方出现一批文化史著作。英国托马斯·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格林的《英国人民简史》,瑞士史学家布克哈特的《希腊文化史》、《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德国史学家里尔的《德意志人民的自然史》等著作,突破传统史学限于上层政治的狭小格局,把研究视野扩展到物质生产、经济关系、社会制度、人民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及各种文化现象。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等论著,也属于这种广义文化史。

三

清末民初之际,一批国外文化史论著被介绍到中国,如日本人永峰秀树翻译的法国基梭(今译基佐)的《欧罗巴文明史》,日本高山樗牛的《世界文明史》,桑戴克撰、冯雄译的《世界文化史》于20世纪上半叶颇有影响。日本人撰写的中国文化史,也有数部被译介,如高桑驹吉原著、李继煌译述的《中国文化史》,白河次郎、

① [法]伏尔泰,梁守锵译:《风俗论》(中文版 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② 见[法]伏尔泰,王晓东译:《路易十四时代》(中文版),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

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1903年竞化书局版),中西牛郎著、刘陶译的《支那文明史论》,田口卯吉的《中国文明小史》(1903年广智书局版)等。

与译介国外文化史著作相同时,中国学者自行编撰中国文化史专著,梁启超为开山者。

梁启超与欧洲启蒙时代伏尔泰等人的史观相通,他1902年撰《新史学》,批评旧史学四病源:(1)“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2)“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3)“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4)“知有事类而不知有理想”。鉴于此弊,梁氏力倡“史界革命”。^①而异于以政治史为主体的旧史,文化史的编纂便是“史界革命”的重要方面。梁氏1921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作专门史与普遍史区分,称“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指出文化史须由具备通识的史家依据专史而撰写。^②

梁启超力纠传统史学以君主和王朝为本位的偏失,倡导以民族文化创造历程为对象的“新史学”。他设计的《中国文化史目录》,包括朝代篇、种族篇、政制篇、法律篇、军政篇、教育篇、交通篇、国际关系篇、饮食篇、服饰篇、学术思想篇等28篇。这种涵盖物质、制度、行为、精神四个层面的文化史,与以政治史为主线的通史相区别。而以广义文化为史书的展开部,是梁氏将文化理解为“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在史书编纂上的体现。惜乎梁氏以56岁盛龄辞世,仅完成《中国文化史稿》第一编(1921)、《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1925),前者是梁氏在南开大学设文化史课程的讲义,后者曾列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材。

以梁启超为端绪,文明史(文化史)被视作——

“叙述进化之现象”的历史(与复古退化的历史对应的文明进化史),

“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的历史(与君史对应的民史),

“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的历史(与神道支配的迷信史对应的理性历史)。^③

承担启蒙任务的文化史学由此在中国揭开序幕。

① 见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四册第九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③ 见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一批学者走出“为皇帝家谱”之旧史学窠臼，开辟文化史的广阔天地。顾伯康批评“吾国史家专为一朝一姓之奴隶”，宣称：“历史之功用，在考究其文化耳。”柳诒徵论及自己文化史著的涉猎范域时说：

世恒病吾国史书，为皇帝家谱，不能表示民族社会变迁之状况……

吾书欲祛此惑，故于帝王朝代、国家战伐，多从删略，唯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而列举之。^①

本此宗旨，柳氏所撰文化史为“物产、建筑、衣裳、图画、雕刻、礼俗、乐舞、学术”各设专章，加以详述，成一特具“文化”内蕴的史著。

正是在启蒙历史观指引下，涌现出一批“略政详文”的文化通史，除上述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撰于 1919—1921 年，1925 年在《学衡》连载，1932 年出版全本）外，还有顾伯康的《中国文化史》（1924），陆懋德的《中国文化史》（1925—1926 年在《学衡》连载），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1937），吕思勉、陈安仁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分别撰写的几种中国文化史也相继问世。其中柳诒徵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认为“礼”是中国文化之“主脑”，这是中国文化区别于以宗教为主脑的欧西文化、印度文化之所在。熊十力 1948 年致书柳氏，称“公精于礼，言史一本于礼，是独到处”。^②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以其史观的独创、谋篇的系统、引述资料的丰富而为学林重视，是 20 世纪上半叶出版的诸文化史中流播较广远的一种。

此间文化史著在历史观上多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地理环境决定论、种族决定论、心理因素决定论的影响，也有以唯物史观解析中国文化变迁的尝试，如常乃德的《中国文化小史》、杨东莼的《本国文史大纲》、陈国强的《物观中国文化》、陈竺同的《中国文化史略》等为此类篇什。

抗日战争时期面世的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就中国文化的地理背景、国家凝成与民族融合、古代观念与古代生活、古代学术与古代文字、东西接触与文化更新等专题将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进行比较，把文化分成游牧、农耕、商业三种类型。钱著与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皆用力于揭示中国文化的动

①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 页。

② 柳诒徵：《国史要义》卷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 页。

力机制，实乃文化生成研究的奠基之作。

出版家王云五致力于文化史研究的集成，其《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一文痛论旧史之缺失：“我国士夫之著作，要皆偏于庙堂之制度，号为高文大册，其有关闾阖之琐屑，足以表现平民之文化者，皆不屑及焉。”^①而王氏主编、商务印书馆 20 世纪 30—40 年代推出的“中国文化史丛书”，采用分科研究法，集结了那一时期文化史研究的实绩。

20 世纪 50—70 年代，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观念制约下，国内文化史研究取消。就学术原因而论，由于把历史唯物主义曲解为经济决定论或阶级斗争决定论，将文化史研究以“文化史观”（历史唯心主义的一种形态）加以否定。这样，广义文化史被社会发展史所取代，狭义文化史则分解到思想史、哲学史、宗教史、科技史、史学史、学术史之中，从“文化史”角度作综合性或专科性考察基本中断。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适值社会转型节点，随着现代化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全面展开，文化学及文化史学研究日渐为社会及学人重视，并获得空前规模的进步。20 世纪 80—90 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卷帙浩繁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取分科研究法，集合 20 世纪晚期专科文化史成果。同时，多种文化通史于 1990 年前后出版，断代文化史、区域文化史、文化专题研究亦有拓展，文化学的理论论争也热烈展开。

有人将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讨论称之“文化热”，又说 20 世纪 90 年代此热渐冷，90 年代末期以后转向“国学热”。其实不应夸大二者的区隔，它们都是中国文化史研讨的展现，虽有侧重面的调整，然考析中国文化的生成、发展及特质，推究中西文化的异同与相互涵化，探讨中国文化现代转化的路径，却是一以贯之、前后照应的。

四

文化研究固然存在容易泛化而落入平面化窠臼的危险，但文化研究的真实价值不可低估。诚如克鲁伯在《文化的性质》中指出，文化概念的发现，是 19 世纪以来人类学史和社会科学史上的重大成就，其意义完全可以同哥白尼日心说对自然科学的贡献相提并论。

^① 王云五：《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胡适、蔡元培、王云五编《张菊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2012 年重印，第 522 页。

在学科分野日益细密、切割化达于极致的现代学林，“文化”是少数具有强大整合力的概念之一，而文化研究因以具有广远的发展空间和精进不已的领域。

梁启超曾用佛学术语定义文化：

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

文化是包含人类物质精神两面的业种业果而言。^①

蔡元培说：“文化是人生发展的状况。”^②

梁漱溟说：文化“是生活的样法。”^③又说：

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④

贺麟从“心物合一”观出发，认为：

所谓文化就是经过人类精神陶铸过的自然。^⑤

冯友兰提出，文化是一种“总合体”，“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之历史、艺术、哲学……之总合体；除此之外，并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单叫做中国文化”^⑥。这与梁启超以文化为人类共业的认识相似。

以上所论，皆广义文化。

陈独秀有感于过于宽泛的文化概念，指出“文化是对军事、政治（是指实际政治而言，至于政治哲学仍然应该归到文化）、产业而言”，“文化的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种”^⑦。

对文化学做专门研究的中国学者黄文山对文化研究的方法作出分梳：纯粹历史

① 梁启超：《什么是文化》，1922年12月7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② 蔡元培：《何谓文化》，《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13页。

③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三章，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0页。

④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⑤ 贺麟：《文化的体与用》，《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32页。

⑥ 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

⑦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

叙述的，心理学与统形论的，因果的与功能论的，理则学的与评价论的，科学的或真实的比较的。而“文化现象，以内部状态为最重要，故心理的、统形的方法，值得重视”。^①

余英时认为文化是“成套的行为系统，其核心则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②他强调：

中国文化重建的问题事实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③

文化史把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作为一个总体对象加以研究，从而与作为社会知识系统某一支发展史（如文学史、史学史、科学技术史、哲学史）相区别。

文化史在研究人类文化发生发展的总体过程时，尤其注意于推进文化的动力机制的考察，从而超越以帝王将相为主角、以王朝兴衰为线索的传统史学，以人类的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进程为展开部，通过对器物、制度、行为等文化具象的把握，透见民族性格及文明走势，洞悉隐藏在物象背后的民族心灵史。

文化既包括人类活动的对象性结果，也包括人在活动中所发挥的主观力量和才能，因此，文化生成史不仅要研究文化的“外化过程”，即人类“开物成务”^④，创造各种物化产品，从而改造外部世界，使其不断“人化”的过程，而且要研究文化的“内化过程”，即文化的“主体”——人自身在创造文化的实践中不断被塑造的“化人”过程，同时还要研究外化过程与内化过程的交相渗透，彼此推引。

《易传》曰：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① 黄文山：《文化学的方法》，收于庄锡昌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 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③ 余英时：《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第七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页。

④ 《易·系辞上》。